

贫 困 论

——贫困与反贫困的理论与实践

樊怀玉 郭志仪 李具恒
荣 立 马顺福 曹洪民

民族出版社

前 言

贫困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人类为了摆脱贫困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二战以后,特别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都把消除贫困作为自己最重要的责任之一。然而,我们看到,反贫困斗争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贫困问题仍然是世界各国的重要社会经济问题。

在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致力于反贫困斗争的同时,对贫困问题的理论探讨和对策研究也在不断深入,从不同学科——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政治学——各个层面、各个角度的研究成果,为反贫困斗争的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导和科学依据。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曾经是世界上贫困人口最多的国家,经过几十年的奋斗,中国的反贫困斗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然而,要彻底摆脱贫困,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一段时间以来,我们一直想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写出一本全面概括和介绍有关贫困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总结的书,这一愿望在甘肃省统计局的支持下得以实现。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本书在民族出版社的帮助下,终于与读者见面。

本书是对国内外研究贫困问题的一个系统概括和总结,是在许多人的研究基础上完成的,其特点一是对关于贫困问题的理论探讨做了目前最为系统地概括和介绍,二是对中国(特别是像甘肃这样的不发达地区)的贫困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刻的理论思考,三是对二十多年来中国一些地区反贫困的成功案例进行了归纳整理。

参与本书写作的有:

樊怀玉,甘肃省统计局副局长,高级统计师,研究生;

郭志仪,兰州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导;

李具恒,西安交通大学博士;

马顺福,西安交通大学博士;

曹洪民,中国农业大学博士;

荣立,兰州大学 MBA;

参与本书其它工作的还有:荣建民、吴继煜、张永芝、常连英、赵之明等。

本书在研究和写作过程中,参考了大量文献著作,我们在参考文献中都给予了反映;在案例分析部分中,收集、整理和引用了一些地方的典型案例,也在参考文献中给予反映。我们衷心的感谢这些文献的作者,没有他们丰富的研究,我们不可能完成此书的写作,这些“巨人”的肩膀,使我们能够在一个新的高度上认识贫困问题。我们也要感谢所有支持过本书出版的同志,特别是在贫困地区调查中给予我们大量支持的同志。

本书可能还有许多不足和值得探讨的问题,希望读者能够指点。

作者

2002年7月26日于兰州

目 录

第一篇 贫困问题的理论考察		
第一章 关于贫困学说的学科背景		1
第一节 贫困的经济学理论		1
第二节 贫困的人口理论		8
第三节 贫困的社会人类学解释		10
第四节 贫困的政治学理论		16
第五节 马克思主义关于贫困的学说		17
第二章 “贫困” 的内涵和外延划分		19
第一节 贫困的内涵		19
第二节 贫困的外延划分		21
第三章 贫困问题的衡量标准		25
第一节 确定贫困线的理论和方法		25
第二节 贫困标准的测定		28
第三节 贫困程度的测定		31
第二篇 世界范围内的反贫困斗争	35	1
第四章 反贫困——世界性的难题		35 1
第一节 世界首富的贫困问题		35 1
第二节 贫困——发展中国家的世纪性难题		39 5
第五章 国际社会的反贫困概况		40 6
第一节 国际社会反贫困的时序档案		40 6
第二节 多元主体反贫困的举措		41 7
第三节 反贫困的主要战略模式		42 8
第四节 反贫困的国际经验借鉴		42 8
第三篇 中国的反贫困与西部大开发战略		
第六章 中国反贫困的巨大成就		58 1
第一节 中国扶贫开发的三个阶段		58 1
第二节 中国扶贫开发的基本经验		62 5
第七章 中国贫困人口的特点		63 6
第一节 中国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农村		63 6
第二节 中国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		63 6
第三节 知识贫困占贫困的较大比重		65 8
第四节 城镇贫困:日益突出的问题		67 10
第八章 西部大开发战略和西部的脱贫		68 11
第一节 贫困地区几次大的发展机遇		68 11
第二节 西部地区扶贫攻坚的新阶段和新问题		69 12
第三节 西部大开发战略与反贫困		71 14
第四篇 中国反贫困的战略思考		
第九章 创新与脱贫		73 1
第一节 创新对基本制约因素的影响		73 1
第二节 制约因素约束下的贫困农户的行为特征		76 4
第十章 政府扶贫——立足于新分析框架的经验与政策		82 10
第一节 对政府扶贫作用的检验		82 10
第二节 对扶贫开发的政策建议		87 15

第十一章 宏观战略与思考	92	20
第一节 建立消除贫困的社会机制	92	20
第二节 改善造成西部地区贫困的特定自然条件	92	20
第三节 推进贫困地区的经济开发	94	22
第四节 建立健全反贫困的政策制度体系	95	23
第五节 以非农化和城镇化推动西部地区生态环境治理	97	25
第六节 从一部分富裕走向共同富裕	98	26
第七节 减少和消除知识贫困	99	29
第五篇 反贫困的地区实践和案例分析		
第十二章 甘肃的贫困特征及制约因素	100	1
第一节 甘肃贫困状况的基本特征	100	1
第二节 甘肃贫困地区发展的基本制约因素分析	101	2
第十三章 甘肃的贫困地区的结构调整	110	12
第一节 甘肃贫困地区的病理分析	110	12
第二节 甘肃贫困地区的结构调整	113	15
第十四章 反贫困的案例分析	117	19
第一节 甘肃定西地区跨世纪反贫困的时代定位	117	19
第二节 陕西省丹凤县反贫困的足迹	124	26
第三节 青海果洛州实施“八七”扶贫攻坚战略的回顾与思考	129	31
第四节 小额信贷——福建长汀模式	133	35
第五节 宁夏西海固地区的脱贫途径及效果	129	40
参考文献	130	41

第一篇 贫困问题的理论考察

第一章 关于贫困学说的学科背景

贫困本身是一个模糊概念,是一个涉及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诸多领域的复杂问题,它不具备确定性。同时,它又是一个过程,它随时间、空间以及人们的思想观念的变化而变化。不同的国家或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由于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的不同,贫困现象形成的原因存在很大的差异,加之人们出发点和世界观上的差别,关于贫困的本质问题,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解释。

第一节 贫困的经济学理论

一、贫困的经济学理论渊源

经济学关于贫困问题的理论解释主要有三个来源,即主流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程丹峰:中国反贫困——经济分析与机制设计,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简单介绍如下。

(一)主流经济学的解释

主流经济学关于贫困问题的理论释义,最初来源于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关于公平与效率抉择问题的讨论。他通过“漏桶试验”提出:假如再分配税收的桶上有个漏洞,假如富人失掉的每1元中只有一部分——也许为 $2/3$ 落到穷人手中,那么在公平名义下的

再分配就伤害了效率的经济目标。保罗·A·萨缪尔森利用“收入可能性曲线”进一步说明了奥肯分析的问题。他把人口分为两个部分,即穷人和富人,各自的实际收入由两条轴线来衡量,X轴衡量富人的收入,Y轴衡量穷人的收入。在图1中,A点代表在征收再分配性质的赋税以前自由放任的结果,E点表示数量相同但收入完全均等的国民生产总值。从A点开始,我们试图通过移向相等收入的E点增进平等。从E点向右下方倾斜的线EA表示收入再分配没有付出代价的情况。该线的倾斜度是负45度,反映出从收入较高的一半人那里转移出来的每1元钱使收入较低的一半人的实际收入刚好增加1元的假定。但是,如果社会过分地征收累进的所得税,可能会降低人们的努力程度,如果穷人收入的下限高到一定程度,他们也可能不再努力地去寻找工作,从而形成图中代表实际收入边缘的背离负45度线向内弯曲的ABZ曲线,因为赋税和转移支付包含了的效率损失,最终可能既伤害了富人也伤害了穷人。因此,奥肯认为平等与效率之间的冲突是无法避免的。当它们发生冲突时,应该寻求折衷的方案,“在平等中注入一些合理性,在效率中注入一些人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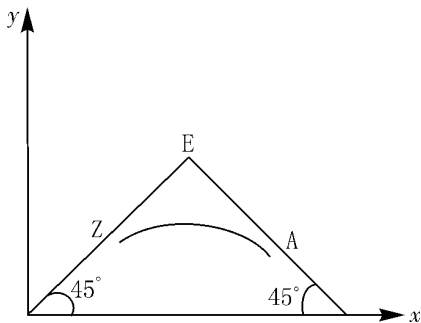


图 1—1

(二)福利经济学的解释

英国经济学家阿瑟·C·庇古1912年出版的《财富和福利》,

建立了福利经济学的完整体系。首先,他根据边沁提出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福利”这一功利主义原则,把福利规定为个人获得的效用或满足,把一个人的福利规定为个人福利的总和,进而把社会的福利规定为全体社会成员的个人福利的总和,并认为要使社会的福利增加,应当使社会上较多的人得到较大程度的满足,而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也就是社会上最大多数人的最大满足。其次,庇古还根据边际效用递减学说提出,如果把富人的一部分收入转移给穷人,富人损失的福利将小于穷人增加的福利,净福利是正的,整个社会的福利将增加。

20世纪30年代后形成的新福利经济学认为,如果在社会上某些人的福利增加的同时,减少了其他人的福利,就不能认为社会的福利增加了。它认为只有在两种情况下社会的福利才能增加:一是社会上所有人的福利都增加了;二是有些人的福利增加了,而其他人的福利并没有减少。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帕累托条件”。新福利经济学的最优条件理论证明,完全竞争的市场能够保证生产和交换的最优条件,而生产和交换的最优条件能够保证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也就是说,市场经济组织的最优化能够使全体社会成员获得最大福利,或者使一部分成员的福利增加而又不使其他社会成员的福利减少。

近年来,以阿马蒂亚·森为代表的一些福利经济学家向新福利经济学的最优条件理论提出了挑战。而且,阿马蒂亚·森因为“他在福利经济学的基础研究课题上做出数项关键性的贡献,例如公共选择的一般理论、福利与贫穷指标的定义、到对饥荒的实证研究皆属其贡献范围”,被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这里,我们主要介绍阿马蒂亚·森发现的“反公平现象”(anti-equality)。他认为,边沁的功利主义将个人的满足水平相加作为社会福利一个度量指标的方法,忽略了人与人之间满足程度的分布状况。功利主义的公平分配必须具备以下假设条件,人

的满足水平依靠他的收入多少,而且所有个人均具有相同的效用函数,每个人由于收入增加所产生的边际满足水平是递减的。阿马蒂亚·森发现,如果两人的效用函数相同的假设不存在,那么功利主义将引致“反公平现象”。因此,效用主义在收入及满足水平两方面均是反公平的,因为将个人之间合计的满足水平极大化,是不须理会这些满足水平是如何分配的。由于穷人在产生满足水平方面未及富人那般有效率,他的境况也因为贫穷而变得更惨。

(三)发展经济学的解释

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奠定了发展经济学反贫困理论的基本研究方法,他通过对不发达国家贫困人口食物保障、营养状况、受教育水平、卫生保健和不平等程度,政府的责任,以及不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和资本流动的研究分析,设计减缓贫困的项目运作体系,帮助贫困人口摆脱贫困。近年来发展经济学反贫困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减缓贫困的政策框架、公共支出、银行信贷工具,以及针对项目的运行机制研究。其中政策框架的研究主要包括影响增长和劳务需求的政策(价格激励政策、规章制度政策、宏观经济政策等)、影响资产积累和持续的政策(人文资本政策、金融资本政策、土地和环境政策等)和对不同政策的影响能力的评估等三个方面;公共支出的研究主要包括公共支出的框架结构、部门问题和支出效率等三个方面;银行信贷工具的研究是通过项目的财政持续性、机构持续性和环境持续性的判定,选择可运用的信贷工具和信贷方式;项目运行机制的研究的重点是典型案例中项目传递系统的效率研究。这些研究大多是由世界银行、联合国计划开发署等国际组织开展进行的。

二、贫困的经济学分析

尽管有许多人都是从经济学意义上来理解贫困的,但是,他们对贫困原因及其机理的解析却又大异其趣,有的从“收入—消费”

进行分析,有的从物价、成本、报酬或分配以至“公平—效率”进行阐释,有的从资本、产业结构上进行剖析,有的则进而从制度变迁、技术进步等层面进行解析,可谓是众说纷纭、见仁见智。

(一)要素短缺论。主要包括资本短缺论和资源贫乏论。

资本短缺论者认为贫困是因为缺乏资本。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对此作了充分的解释。他认为在贫困国家存在两种循环:一是在供给方面低收入意味着低储蓄能力,低储蓄能力引起资本形成不足,资本形成不足使生产率难以提高从而造成低收入;二是在需求方面低收入意味着低购买力。这两种循环的核心是低收入造成了资本低水平的供给和需求。资金短缺实际上就是资本投入不足,这在中国也是较严重的问题。在贫困地区资本积累的速度和规模始终是十分有限的。即使积累了部分资本,也得投放到燃眉之处,如解决温饱、生产生活的救济、自然灾害治理等,实质性的生产投入得不到足够的资本支持。资金短缺论的适应范围是狭小的,这是因为:(1)从资本运动规律看,资本供需态势是经常变化的,资本短缺与资本过剩往往是互补的,在贸易自由主义政策条件下,引进资本,补偿贸易等形式可以减缓资本短缺,如地中海沿岸石油输出国的石油开发等。(2)经济增长的起动力来自储蓄比率,而非储蓄水平,即使从储蓄水平看,贫困国家中贫困阶层人数众多缺乏储蓄能力,但实际上一些穷国的储蓄率却很高,如印度目前投资率和美国近年的水平 17% 相差无几。另外在中国发展快的地区与贫困地区之间还有一种怪现象,贫困地区的储蓄增长有时还快于发达的地区,储蓄资金大量从西部流向沿海。(3)资本对摆脱贫困意义重大,但若不从体制和政策上做调整,有了资本也运用不好,资本使用效率低,投资成本大。

发展经济学资源贫乏论者认为贫困国家片面采取“西化”的发展模式是贫困的根源所在。从 60 年代起,贫困国家普遍把资本、资源集中在以城市为依托的工业上,忽视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从

而加剧了贫困国家中的二元经济结构,构成了农村持续贫困的直接原因。农业资源贫瘠是绝大多数贫困国家农村贫困的共同原因,中国也是如此。中国西高东低的地势,使山区、半山区和丘陵区占西部 11 省总县数的 76%。除云贵高原外,西部气候干旱,内蒙和西北 5 省年降水量在 400 毫米以下。而降水较多的云南、贵州和广西,60%的县为岩溶地区,这样的自然条件显然不利于种植业发展。但是,资源贫乏并不是不能克服的,国际上无什么资源或资源稀少的国家依靠发展劳务输出、转口贸易、委托加工、技术开发等摆脱贫困者很多。就中国而言这样的例子也不少,如苏南地区、温州地区、珠江三角洲等,过去都同样贫困,也没有什么资源,但依靠发展乡镇企业和家庭工场富起来了,所以说资源贫乏不具有绝对意义,因为与资源贫乏相对应的还有技术存量、劳动存量和制度因素等。

(二)不均等和贫困的理论

在经济理论的古典阶段,贫困、不平等以及它们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理论工作者们主要关注的问题([美]吉利斯 波金斯 罗斯诺德格拉斯 著 黄卫平 总译校 彭刚 杨瑞龙 等译。发展经济学(第四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

1. 李嘉图的两部门模型

李嘉图最先提出了两部门的发展模型。他的分析表明,英国的谷物法是在外国竞争下保护粮食耕种者的利益的,若不废除之,并使进口概念能促进工业革命,收入的再分配会从资本家向地主倾斜(他假设工资维持在最低水平)。由于李嘉图认定地主是挥霍浪费的,而且确信经济增长的资金都来自资本家节俭的储蓄,因此他认为,这种再分配有害于经济增长。

虽然他的理论具有创建性,并且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但李嘉图有关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的全部预见被证明是错误的。在实行工业化的国家中,地租(地主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并未不断上

升,而是仍然保持着很小的份额。利润的比重(资本家的收入)并未被挤掉,工资也没有仅仅维持在最低水平上,至少在工业发展的后期阶段是上升的。如果发生了什么情况的话,那便是工资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趋于提高。造成实际趋势与李嘉图预言不相符合的原因有好几个。其中之一是英国并未像李嘉图所希望的那样实行自由贸易。即便英国不这样做,收益递减也可能在在很大程度上被技术变革抵消掉,而技术变革本身就使得在既定数量和质量的土地上生产更多的食物成为可能。李嘉图还过高地估计了马尔萨斯人口机制的力量,他认为这一机制会将工资维持在最低水平上。

2. 马克思的观点

卡尔·马克思也确信,资本主义的发展将会导致日益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平等。他认为,资本家有着一种生产出“失业后备军”的冲动,这一大军的大量存在,将确保在业工人的工资停留在最低水平上。在马克思的思想中,资本的所有者既控制着经济,也控制着“资产阶级国家”。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利润率下降,各种危机发生,并造成企业的破产和产业集中程度的提高,终于在最后丧钟般的危机中使资本主义崩溃,并为社会主义所取代。按照卡尔·马克思的学说,只有到那时,工人的状况才能得到改善。

3. 新古典理论

19世纪后期、20世纪初期,用来解释发达国家收入分配的主流理论问世了。新古典(边际生产率)理论假定,所有生产要素(考虑到质量上的差异,今天要素已不止是土地、劳动力、资本这三种了)在供给上都是稀缺的,而且在一个竞争的要素市场中,它们的报酬率与其边际产品是相等的。此理论与发展中国家也有关系,但其适用性却颇有争议,因为该理论的假设,即产品和要素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在发展中国家的环境中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4. 劳动剩余模型

在分析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方面,可以替代新古典主义理论的,是由 W·阿瑟·刘易斯提出的劳动剩余模型。刘易斯第一个观察出欠发达国家的环境在某些方面更像工业革命之前的工业化国家,而不是今天的这类国家。因此,它是有助于分析低收入国家运作的理论,其假设条件应当建立在古典而非新古典的基础之上。这一见解使刘易斯提出了著名的“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模型,该模型采用了李嘉图—马克思的假设,即在固定的实际工资水平下,劳动力数量供给是无限的,而非新古典理论中的一种稀缺的生产要素,必须在其他用途中用高价才能买到手。劳动剩余模型表明,随着发展的出现,不平等最初会加剧,然后会消失,因而它与库兹涅茨对于实际发生情况的概括是一致的。不平等最初为什么会加剧?刘易斯提出了两个原因:其一是资本家(即那些控制资本的人,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收入比重会随着现代化部门或资本主义部门规模的扩大而提高;其二是当不断增长但总数仍然不多的劳动者,从最低的维持生存的工资水平转移到资本主义部门工资水平(刘易斯认为从实际工资看,总的讲,要高于前者 30%左右)时,劳动收入分配内部的不平等在早期阶段也会加剧。

如果这种说法看起来不那么直观的话,我们可以想像在二元经济中,如同刘易斯所假设的,一个部门内无工资的差异,但在两个部门之间却有 30% 的差异。在这种情况下,当全部工人都为低工资部门所雇用时,劳动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在发展过程的初始为零,在发展过程全部结束,所有工人都为高工资部门所雇用时,不平等程度再次为零,而在两种极端之间的情况时,劳动收入分配会出现某种不平等。在这种简单的模型中,劳动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将上升,当一半劳动力为高工资部门所雇用时开始下降。

发展早期阶段不平等加剧的趋势,在剩余劳动被现代化部门的就业最终全部吸收之后,会有力地向反方向运动,正像费景汉——拉尼斯扩展刘易斯模型所明确表述的那样。在新的转折点

上,劳动力成为稀缺的生产要素,需求进一步增长,便会使实际工资上升,以吸引劳动力从边际使用中解脱出来。该模型所表明的工资水平普遍提高的结果,带来的不仅有不平等的最终下降,而且还有人们常常企盼的消灭贫困,至少从过去的标准来看是这样的。

在刘易斯的劳动剩余模型中,不平等并不仅仅是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而且也是增长的原因。向高收入阶层倾斜的收入分配,将有助于增长,因为利润获得者们节俭储蓄以求得到扩展企业的资金。他们的收入愈多则投资愈多。这些人的储蓄和投资对于增加生产力和从而使产出增长是最基本的。刘易斯认为,“经济发展理论的中心问题在于,要认识和理解一种转变过程,即从先前储蓄和投资占国民收入4%或5%的社会,转变为自觉地使储蓄达到占国民收入12%~13%甚至更高的国家的过程”。他论证说,劳动力剩余的国家中,10%的人口要占有40%甚至更高的国民收入。当富足者的储蓄更多时,便会产生增长,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的边际储蓄倾向提高了,而在于在收入总额中他们所占的绝对量和份额增长了。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是由于随着现代化部门的增长,收入中利润比重上升了,而同时工资却维持不变。

照刘易斯看来,不平等不仅的确有助于增长,而且对收入进行“早熟”的再分配,还会造成抑制经济增长的风险。在李嘉图的理论中,任何使城市工资提高的因素都将减少利润,从而减少储蓄、投资,并使经济增长放慢。包括相对于制造业产品价格而言的食品价格的上涨,以及工会的讨价还价,或政府通过立法的行为使现代化部门工资增长等因素,也许会具有这样的结果。但这种做法却会一无所获,因为如前所述,在贫困国家中,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可供再分配。刘易斯认为,如果人们等待发展按规律进行,每个人都将会赶上受益。暂时不平等的加剧,是为有所获而必须付出的代价。

虽然劳动剩余模型近40年来一直属于主导地位,但它从未

为人们普遍接受,而是常常受到挑战和质疑。对于该模型,人们提出了以下问题:资本家是节俭的还是放纵于奢侈消费的?如果他们是节俭的,那他们是在国内投资?还是会到海外去寻求更高的回报率?尤其在可以使用从发达国家进口的资本密集型技术,并且该技术并不适用于贫困的劳动剩余经济的要素禀赋时,资本主义(现代化)部门吸收劳动力的速度有多快?最后,今天的发展中国家政府是否能够等待积累过程产生作用,等待增长的利益最终能惠及到全社会?或者由于贫困,人口增长和政府的不稳定,要求政府较早地对收入再分配进行干预?

(三)家庭生命周期说

“家庭生命周期说”是俄国著名经济学家恰雅诺夫(A. V. Chayanov)依据生物学规律创立的。这个理论认为,小农经济状况主要随家庭消费者与生产者的比例周期性变化而起落。恰雅诺夫用“劳动消费比率”表示劳动力占家庭人口总数的比重,则劳动消费比率越小农户就越贫困,反之,农户贫困程度就越轻。在青壮年父母不需要供养老人而又没有子女时,家庭经济条件最佳,在没有劳动能力的消费者(儿童或老人)至多时最差。恰雅诺夫还认为,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农户间存在相对贫富差别的原因,正是这种“人口分化”的结果,而不是当时官方学派夸大的农村“阶级分化”。

孔祥智、马九杰在《中西部地区农民贫困的机理分析》中就认为:“劳动消费比率指标,对于分析和解释中国农村的贫困以及农户的贫困水平,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在贫困地区,相同条件下的农户,人口越多,家庭总人口中劳动力越少,则农户的贫困程度越大。”他们认为,劳动消费比率之所以能够解释和反映中西部地区农民的贫困及其水平,主要原因在于贫困地区农户消费压力的不断增大,以及资源禀赋的匮乏,以至农民所拥有的劳动力数量成为农户经济流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他

们在应用“家庭生命周期说”解析贫困时,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假设,即在完全封闭状态下,农户利用自家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进行生产活动,其产品的一部分用于家庭成员的消费,以完成劳动力和家庭再生产过程;其余部分用于积累,以作为家庭的延迟消费和家庭安全保障以及下一个生产周期的投资。但是,事实上,即使在这样一个完全封闭性假设条件下,这一理论还是不能完全解释由于人们自身“质”的差别(如科技文化素质的不同、观念和价值观的区别)造成的贫富分化。

(四)“二元经济论”

还有一些人试图运用“二元经济”理论来解释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贫困及其经济发展。“二元经济”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学家、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威廉·阿瑟·刘易斯在1954年发表的《劳动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提出来的。所谓“二元经济”,是指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是由两个不同的经济部门组成的,一是传统部门,主要是自给自足的农业及简单的、零星的商业和服务业。这里的劳动生产率很低,其边际劳动生产率接近于零甚至是负数,存在着大量的隐蔽失业,这部分过剩劳动力被称之为“零值劳动力人口”;二是现代部门。包括采用较先进技术的工矿业、建筑业、近代的商业和服务业等。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经济之所以长期陷于低水平漩涡和贫困化的主要原因是大量“零值劳动力人口”的存在以及“二元经济结构”转型的障碍。因而,刘易斯主张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应突出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张。按照他的逻辑,经济发展的实质,就是工业部门的不断扩大和农业部门的日益萎缩。其次,在工业化过程中,农业部门的任务就是为工业输送剩余劳动,以廉价劳动力为工业部门创造利润,累积扩大再生产的资本。可能是受刘易斯这一理论的影响,中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走的正是刘易斯式“工业化”道路,但遗憾的是,这个理论却解释不了那时中国及其以后一二十年中国长期陷入普遍贫困的

命运。

重工轻农的思想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国际经济学界颇为流行,除了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论外,另一个较有影响的观点是“剪刀差”理论。普雷比什和辛格尔两位经济学家认为,由于工农业产品比价不合理,工农业产品间的交换存在“剪刀差”,即工业“剥削”农业。这一理论在我国经济学界也有特别的影响。80 年代,国内一些经济学者就曾运用“剪刀差”理论来解析我国乡村的贫困以及城乡发展的差距。这一理论主要还是建立在商品的不平等交换之上,而这一点正是它的局限所在。实际上,不论是“二元经济论”还是“剪刀差”理论,都只是对某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不发达的个别现象的描述而已,却不能揭示这些国家或地区普遍贫困的真相。不幸的是,凡是遵循这些理论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不仅农业凋敝,工业发展也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

(五) 贫穷经济学

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也是从传统小农经济来分析贫困问题的,他认为,传统农业是“贫穷”的经济,而他所说的传统农业则是“完全以农民世代使用的各种生产要素为基础的农业”。与刘易斯不同的是,他认为农业可以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源泉。他说:“对于农业能否成为经济增长的一台强大发动机,已不再有任何怀疑了。”欧洲、以色列、墨西哥和日本正是通过农业而使经济得到了比较快的发展。但是,他强调只有现代化的农业才能对经济增长做出重大贡献,而使用传统要素的农业无法做到这一点。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把传统农业改造为现代化的农业。在改造传统农业中,他尤其注重现代生产要素的引进。那么,如何才能引进现代生产要素呢?舒尔茨认为,建立适当的制度、从供求两个方面为引进现代生产要素创造条件和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是最重要的三个方面。特别是“人民的后天能力的提高,实用知识的进步,是未来的经济生产率及其对人的福利贡献的关键所在”。舒尔茨